

日本右翼思潮与右翼团体史考

林晓光

内容提要 近年来,日本的右翼团体为侵略历史翻案的活动日益猖獗,每每在历史问题上干扰和破坏中日关系的大局。日本的右翼势力是如何发展而来的,究竟由哪些人组成,有什么样的政治主张?对于日本政治外交和国家发展方向,对中日关系和亚太地区和平,将可能造成何种影响?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本文将就此做一简要的历史回顾和分析介绍。

关键词 日本 右翼 思潮与团体 历史与现状

在 20 世纪的日本近现代历史上,右翼团体一直是一个“老资格”的活跃角色,日本 100 多年来的几乎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幕前幕后,都有右翼团体或明或暗的憧憧鬼影,一次又一次地扮演了并不光彩、但却不容忽视的角色。因此,考察日本右翼团体及其右翼思潮的历史沿革和现状,对于我们认识时至今日仍然猖狂活动的日本右翼及其对于日本政治外交和国家发展方向的影响,都是有意义的。

—

右翼团体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怪胎。早在日本明治时期的 1881 年,日本近代右翼团体的开山鼻祖平冈浩太郎、头山满和内田良平等人就提出了“敬戴皇室,爱重本国”的口号,反对明治政府学习西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欧化政策”。

· 179 ·

为了将右翼的政治理念和思想付诸实施,他们成立了右翼团体“玄洋社”,是为日本近代第一个右翼团体,成为右翼国家主义运动之源。此后,日本国内的右翼分子先后组织起自己的政治团体,其荦荦大端者如“黑龙会”、“犹存社”、“民间社”等,虽名目不同、口号各异,但思想渊源无不出于“玄洋社”。一时间,日本列岛上右翼团体纷纷鼓噪出笼,犹如过江之鲫。

20世纪初,是日本右翼团体在组织上和右翼思潮在思想上都迅速发展的时期。在思想上,北一辉和大川周明等所谓右翼“理论家”先后写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日本的文明》、《大日本帝国主义的使命》等著作,鼓吹用皇国至上、忠君尚武、种族优秀等思想理论改造日本,是为右翼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组织上,日本政府为扩大对外侵略,为加紧从思想和行为上控制国内舆论和民众,于1910年将全国各地以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为宗旨的在乡军人团体统一组成“帝国在乡军人会”,以民间团体的面目出现,鼓吹军国主义,支持对外扩张,配合官方镇压国内反战运动。这一具有官方背景的右翼团体与所谓民间右翼团体不仅在政治口号、思想理念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热衷于暴力的行为特征,也与右翼团体动辄大打出手的特征如出一辙。这样一来,一些具有在乡军人身份的右翼分子同时加入了民间右翼团体和“帝国在乡军人会”,使这两个团体在人员构成和组织功能上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巩固,在思想理念上的军国主义、国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进一步同流合污,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对内实行法西斯专制统治的吹鼓手和马前卒。

日本的大正年间(1911—1924年),社会主义学说在日本广泛

(日)荒原补水:《增补大右翼史》,大日本一诚会出版局1974年版,518—519页。

(日)荒原补水:《增补大右翼史》,大日本一诚会出版局1974年版,518—519页。

传播,成为日本国内社会进步思潮的主流,各种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报刊,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团体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各种进步活动风起云涌,工人罢工、农民抗租、市民“米骚动”,左翼进步力量逐步壮大。为镇压国内进步力量,日本政府一方面动用国家专政力量实行白色恐怖,另一方面鼓动右翼团体出手。各右翼团体原来就是为了与左翼对抗而形成和发展的,此时遂倾全力走上街头,与左翼团体正面冲突、大打出手,企图以街头暴力阻止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和国内进步运动的发展。从此,右翼团体以“为国分忧”的“侠义右翼”自居,并进一步介入国家政治权利的争夺和角逐,也促使日本国内政治进一步军国主义化。因此,日本右翼的形成与发展特点之一,即是右翼往往是作为左翼的对立面而存在和发展的;在很多情况下是先有左翼,后有右翼;先有左翼的进步思想,后有反对左翼思想的右翼主张。这一消极、被动、从属性的特点,尤其以日本的右翼最为突出。

日本昭和(1925—1989年)初年的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势力加快了夺取政权的步伐,图谋尽快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与军国主义势力同流合污的右翼团体也不再满足于仅仅在统治体制的外围摇旗呐喊。配合行动,他们伙同军部法西斯势力将恐怖暴力行动的频率和规模都大大升级,接二连三地制造政治性暴力事件,试图以凶杀和流血恐吓民众,为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统治鸣锣开道。1930年,滨口雄幸首相被“血盟团”的右翼分子刺伤,不久伤重身亡。1931年,军部法西斯分子和右翼团体狼狈为奸,叫嚷着“一人一杀,一杀多生”,制造了更多的流血事件。2月9日,刺杀了民政党核心人物、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3月5日,又刺杀了三井公司的董事长团琢磨。5月15日,连现任首相犬养毅也被右翼分子刺杀身亡。1936年,军部法西斯分子和右翼团体以“樱会”为中心,制造了更大规模的军事政变——“二二六事件”。

在兵变中,内阁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3名高级官员被杀,首相冈田启介也遭到右翼分子追杀,侥幸免于死。在这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中,右翼团体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不仅伙同军部法西斯势力镇压左翼进步力量和国民反战运动,而且进一步扩大了暴力打击对象的范围,开始向不积极支持国家政治全面法西斯化的资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人物开刀,既推动了日本国家政治外交和社会思潮的军国主义化和法西斯化,也促使右翼团体的力量迅速膨胀起来,成为日本国内一支逆历史潮流而动、令人谈虎色变、闻之丧胆的政治力量。据日本警察厅公安二课的统计,到1939年,日本全国共有右翼团体1733个、成员182192人,达到了战前右翼团体有组织力量的最高峰。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12月9日,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把战火烧到了几乎整个亚太地区。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侵略,加强国内法西斯专制和恐怖主义统治,日本政府把全国所有的民间政治性团体统一组成“大政翼赞会”,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右翼团体也进一步成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战争体制的一个子系统,为虎作伥,充当了把日本人民引向惨痛灾难和罪恶深渊的反动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大兵以战胜者的身份耀武扬威地踏上了樱花之国,叼着玉米芯烟斗的美国远东战区司令长官麦克阿瑟成了日本的“太上皇”。为了使日本不再成为胆敢与美国在太平洋上一较短长的对手,美国政府对日本进行了带有资产阶级

(日)荒原补水:《增补大右翼史》,大日本一诚会出版局1974年版,518—519页。

民主主义性质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思想和社会各个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日本政府秉承美国占领军的意志,于1946年发布了“敕令第101号”,又在1949年颁布了《团体规正令》,严厉禁止右翼思想的宣传和右翼团体的活动,宣扬军国主义和从事暴力的右翼团体均被强制限期解散;其全部财产被没收充公转归国库;骨干分子被褫夺公权,不得从事政治性活动,不得担任国家公职,不得出任教育和媒体的从业人员。曾几何时气焰甚嚣尘上、不可一世的右翼团体一时间内树倒猢猻散,不得不偃旗息鼓、销声匿迹。

但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促使美国将对日政策从“抑制”改为“扶植”,并加紧推动在“宽大的条件”下尽早实现对日媾和。美军占领当局宣布解除对右翼分子的“褫夺公权处分”,右翼分子一个个沐猴而冠、弹冠相庆,战前的右翼团体绝路逢生、死灰复燃,战后新成立的右翼团体也先后出笼、应运而生。他们本性不改,重新活跃在日本国内舞台上,或开着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穿梭大街小巷,声嘶力竭地沿街叫嚷;或扎起头巾、挥舞着垒球棒,冲击左翼进步团体的集会游行;或竭尽流氓无赖之能事,邮寄手枪、子弹,恐吓各界进步人士。早在30年代就以制造流血恐怖事件而臭名昭著的“血盟团”也趁右翼团体疯狂活动之机死灰复燃,在老首领井上日召的率领下成立了“日本同盟”。著名的右翼头目、原大日本生产党总裁吉田益三1952年8月在大阪成立了以旧军人为主体的“战友会”。据日本警察厅统计,到1952年右翼团体“全日本反共同盟”成立时,日本全国已有270多个积极上街活动的右翼团体、总共约四、五万人。而据日本公安调查厅的统计,

日本警察厅《警察白皮书》,各年版。

到1953年,全日本共有750个右翼团体。这2个统计数字相差较大的原因,在于后者包括了右翼团体的支部。无论如何,2个数字都足以说明日本右翼势力迅速增长的情况。为了避免美军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的整肃或压制,无论是死灰复燃的老右翼,还是刚刚成立的新右翼,大多标榜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其思想主张和纲领口号几乎与美国的占领政策完全一样,并不突出其军国主义或国家主义的本质特征。但是“旧金山和约”签定后,日本右翼势力认为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有利于他们的变化,于是再一次公开打出了“天皇制国体”、“天皇中心”、“民族至上”的旗号,鼓吹“忠君、反共、修宪、强兵”,要求恢复到战前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抛弃了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外衣。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日本全国兴起了一场波澜壮阔、如火如荼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国民斗争,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发动了23次全国统一行动,参加人次多达1亿1500多万,动员民众之广泛、声势规模之浩大,在日本国民运动史上前所未有。为了镇压这一国民运动,日本政府调集了庞大的警力,右翼团体也狐假虎威、蠢蠢欲动,配合警察与广大爱好和平的日本国民相对抗。1960年6月5日,“维新行动会”等右翼团体协助警察野蛮镇压日本“全学联”的游行队伍,造成东京大学女学生桦美智子死亡、555人受伤的流血惨案。这一类热衷于街头暴力的右翼团体被称为“行动右翼”,他们不仅参与镇压左翼力量和国民运动,也疯狂地袭击、恐吓各界进步人士以及与他们政见不同的各界知名人士,甚至在公开出版物中鼓吹暴力。右翼头目井上日召在1947年出版《日召传》时,还故做姿态地声称:“非合法运动的时代已经过去”,要通过合法的方式“致力于日本的新建设”。但在1953年

(日)荒原补水:《大右翼史》,大日本国民党出版,1966年,第470—471页。

重新出版这一自传体著作时,就公开叫嚣:“现在日本结束了占领”,“已经进入了强力的时代”,“我也恢复了自由”,“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革命者”,自传的书名也改为《一人一杀》,腾腾杀气,跃然纸上。

1960年10月22日,参加过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的右翼分子山口二矢在一次群众集会上,于众目睽睽之下,刺杀了主张民主、和平的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1961年,一伙右翼分子因不满“中央公论”所刊登文章的观点和政治倾向,竟然袭击了中央公论社社长岛中的住宅,致使2人受伤。1968年,一些右翼团体甚至策划以暴力冲击访日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企图制造重大的国际事件,只是由于日本警方戒备森严,才未能得逞。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右翼势力以亲美、反苏、反共、反左翼等特征,作为思想与行动的基本方针。但对于日本右翼来说,“亲美”仅仅是迫于美国强大压力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手段。右翼头子赤尾敏坦承:“我的亲美反共不是从属于美国,而是谋略。因为单靠自卫队无法保卫国家,必须依靠美国。”右翼理论家荒原补水也认为:右翼的“亲美政策不是本质,是战术策略。现在美国为了保卫美国不得不加强日本。我们正可以利用这一点,强大战败以来凋敝不堪的祖国,提高祖国的地位”。因此一旦日本经济发展,国力强大起来,右翼就迅速把“亲美”方针改为“反美”方针。

进入70年代,一批在理论和口号上有别于“传统右翼”的“新右翼团体”出现。1970年,池田喻出版了《日本的右翼》一书,公开批判战后以来日本右翼的“亲美反共”路线。他认为:“支持腐败的

〔日〕井上日召:《一人一杀》,新人物往来社1972年版,第397页。

〔日〕猪野健治:《评传·赤尾敏》,联合出版株式会社1991年版,第219页。

〔日〕荒原补水:《大右翼史》,大日本国民党出版,1966年,第470—471页。

自民党政府,赞成从属于美国的安保条约,背离了明治维新以后的右翼传统。不要忘记,正是资本主义经常是右翼的敌人。”首次提出“反美”、“反体制”的“新右翼”的口号。而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的自杀事件则使“新右翼”进一步从主张的更新发展到行动的改换。“一般而言,把三岛事件之后的新民族派运动称之为新右翼。也有人说‘是三岛缔造了新右翼’。”铃木邦男于1973年5月创立的“一水会”,被认为是“新右翼”的第一个团体。所谓“新右翼”,系“指战后产生的、反对战后右翼‘重视反共,拥护体制’,主张回到右翼运动的‘反体制,国家革新’的本质原点,为此不惜使用暴力的团体及个人。由于是以批评既有右翼的形象出现于媒体上,所以被称为‘新右翼’。昭和45年(1970年)11月的三岛事件给高呼‘打倒战后体制’的民族派学生以强烈冲击,(三岛宣言)中‘从国家寻求生命以上的价值’一语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出现了继承三岛精神的团体,是为‘新右翼’的诞生”。

“新右翼”的特点,一是反美反苏。他们认为:美苏合作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被称作Y.P体制),是导致日本战后“半殖民地状况”的“罪恶之源”;Y.P体制在日本的建立是反天皇、反国家、反民族的;战后对日本战犯进行的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导致了日本的“自虐史观”;“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像“紧箍咒”一样,束缚了日本独立自主地发展壮大军事力量的手脚,使日本难圆“军事大国”之梦。而与日本社会制度不同的苏联则占领了北方四岛。所以他们不仅反苏、也反美。特别是随着日美两国之间的经济摩擦逐渐激化并日益扩展到科技、金融

〔日〕铃木邦男:《新右翼——民族派的历史与现在》,彩流社1990年版,第37页。

〔日〕警备研究会:《简明极左、右翼、日本共产党用语集》,立花书房1998年版,第196页。

领域,致使双方在心理感情上的抵触和对立表面化,“新右翼”更是全面否定了“传统右翼”的“亲美反苏”路线。

二是反对现行体制。他们把日本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政治体制看作是“美国一手炮制的“畸形儿”,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恢复到战前的天皇中心、军部专制的政治体制,所以反对支持现行政体的资产阶级政党以及作为政党后盾的经济界。1975年,日本政府批准了“防止核扩散条约”,右翼团体认为这等于是在核武装问题上作茧自缚,不仅大声鼓噪公开反对,而且殴打了当时的首相三木武夫。1977年,被称为“财界大本营”的财界四团体之一“经团联”的总部,也因强有力地支持战后的政治体制而遭到右翼团体的袭击。但不论新、老右翼团体在政治理念、行动口号上有何分歧,其政治主张在反共这一点上并无二致。荒原补水认为:右翼团体“没有一个不高举反共的大旗”。战后以来,日本共产党一直是右翼团体暴力活动的主要目标,日共基层干部被刺杀,日共活动场所被捣毁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1973年连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也遭到右翼分子的袭击,幸未遇难。1981年12月,日本民族独立义勇军在神户的领事馆放火,并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承认东京审判的欺骗性、犯罪性;为被以战犯名义镇压的日本人恢复名誉,进行赔偿;宣布占领军强加的宪法无效,并进行道歉;对美国文化在日本的泛滥谢罪;废弃日美安保条约;撤走作为日本民族奴化象征的美军基地”。

因此,新右翼实际上继承了战前右翼的全部思想主张,是战前右翼势力的重新组织和改头换面。日本警方认为:“新右翼是以

(日) 堀幸雄:《战后的右翼势力》,劲草书房1983年,第196—199页。

(日) 荒原补水:《大右翼史》,大日本国民党出版,1966年,第470—471页。

(日) 铃木邦男:《新右翼—民族派的历史与现在》,彩流社1990年版,第211页。

‘一人一杀’、‘一杀多生’为基点的战前‘革新右翼’,是战前制造‘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神兵队事件’、‘二二六事件’的有关人士及战前民族主义领导人培育出来的精神。”新右翼”是战后诞生的本流右翼。

80年代以来,日本国民对右翼团体动辄上街鼓噪、制造音声污染和频频采取暴力恐怖的行为日益反感,对于右翼团体主张把日本拉回到战前去的政治诉求也毫无兴趣。右翼团体眼见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遂在口号、行为和组织上进行了一些换汤不换药的变革,以邀买人心,争取国民的支持,扩大和巩固自身的社会基础。一是开始注意国民人心所向的环境保护和能源问题。提出了“节约能源”、“制止公害”、“保护日本清洁的河山”等口号;二是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政府提出了“政治大国”、“国际大国”的发展目标,右翼团体也明确要求从苏联手手中“夺回北方领土”,以及针对美国提出“反对农产品自由化”等口号;三是大肆鼓吹迅速扩充军备,把自卫队改为正式的军队,研制核武器、实现核武装,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明目张胆地要做军事大国。

在组织上,由于警方对黑社会和街头暴力活动的严密查缉和大力打击,一些从事黑社会活动的右翼团体为了维持生存,改头换面,摒弃单纯的暴力犯罪活动,以政治性团体自居,开始从事表面上合法的政治活动,被称为“标榜右翼”。据日本警察厅1989年的统计,由黑社会暴力团演变而来的政治性右翼团体,在全日本共有340个,核心成员4000多。

实际上,信奉皇道主义、国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性右

〔日〕警备研究会:《右翼的思想与行动》,立花书房1989年版,第142页。

〔日〕崛幸雄:《战后的右翼势力》,劲草书房1983年版,第196—199页。

日本警察厅《警察白皮书》,各年版。

翼团体与崇尚“一刀一枪”的黑社会暴力团体本来就是一丘之貉,他们在政治理念和恐怖行为上,本来就是如出一辙、身兼二任的,右翼团体与暴力团是日本社会中两位一体的双头怪蛇。但不管右翼团体如何变化,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尤其是恐怖暴力行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989年,2名右翼分子驾驶着满载汽油桶的卡车,试图冲击竹下登首相的官邸。同年5月,日本社会党书记长山口鹤男因遭到2名右翼分子袭击而受伤。1990年1月18日,长崎市市长本岛因发表了“天皇也负有战争责任”的见解而遭到右翼分子的枪击,身受重伤。当年2月21日,自民党元老、前首相中曾根康宏的选举事务所也受到右翼分子的袭击和破坏。

三

在日本国内政治舞台和社会生活中,右翼团体虽然人数不多,仅占全日本人口的千分之一左右,但具有人员少、能量大、活动频繁、气焰嚣张、肆无忌惮等特点,对日本政治发展方向和国民政治意识倾向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右翼团体一直以来都是日本统治阶级所用来维护保守体制、对付革新势力的工具和打手,但一旦右翼团体的暴力活动破坏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引起国民的不安和国内局势的动荡,就将不利于日本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所以日本统治阶级也对右翼团体的暴力活动采取了一定的控制措施。

战后以来,日本警方每年均能抓获大量从事街头暴力活动、触犯刑律的右翼分子,其中50年代平均每年80人,60年代平均每年250人,70年代500人左右,80年代则上升到600人以上,特别是1982年683人,1983年690人,是为战后的最高记录。鉴于右翼团体活动猖狂,日本警察厅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地警方加紧取缔右翼团体的街头暴力活动。东北地区警视厅专门成立了第三

课,调集100多名干练的警官,集中对付右翼团体的暴力犯罪活动。在警方的大力打击下,右翼团体的暴力活动有所收敛,被捕人数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到1989年下降为218人。但这仅仅是右翼团体的发展势头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并不等于右翼团体的势力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沉重打击,也不等于右翼团体甘心从此退出政治舞台,一遇到适宜的环境和气候,右翼团体就会迅速卷土重来、兴风作浪。9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上升,政治情势保守化,右翼团体趁机再次活跃起来。据日本警察厅1990年12月21日发布的“1990年犯罪情况统计”表明,右翼团体因进行街头暴力而导致的发案率和被捕人数分别比上年增长17.9%和9.3%。因此日本警方于1991年起草了一项新法律,谋求更为有效地控制右翼团体的暴力犯罪活动。据日本《警察白皮书》各年版记载,右翼团体的组织规模和成员人数自战后以来一直呈比较稳定的状态。1963年时有400个团体,11.5万人,1972年有500个团体,12万人,1980年为700个团体,12万人。另据日本平凡社1982年版《百科年鉴》记载,当年日本右翼团体有720个,12.5万人。日本《选择》月刊1989年1月号所载《现代“右翼”之研究》中的统计数字则为,1988年全日本右翼团体有840个,成员12.5万人。同一刊物2000年5月号的统计数字为,右翼团体900个,成员总数10万人。

从上述这一组数字中,可以发现战后日本右翼团体在组织和人员上的如下几个特点。

〔日〕崛幸雄:《战后的右翼势力》,劲草书房1983年版,第196—199页。

日本警察厅《警察白皮书》,各年版。

日本警察厅《警察白皮书》,各年版。

《现代“右翼”之研究》,〔日〕《选择》月刊1989年1月号。

第一是团体个数不断增加,但骨干成员基本稳定。12万人左右的骨干成员人数虽然比战前的18万人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一,但几十年来一直保持了骨干队伍的稳定。这就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1. 右翼团体的政治主张和行为方式得不到广大日本国民的认同和支持,只能代表日本社会上极少部分人;2. 在当今日本社会,仍然存在着右翼团体赖以生存、活动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经济、思想、心理等多方面的条件。

第二点是第一点的逻辑的发展和必然,即右翼团体个数增加和人员稳定的特点,必然导致右翼团体平均人数的下降和每个右翼团体组织规模的缩小。从1963年到1989年,右翼团体的平均人数从287.5人减少到148.8人,减少幅度达44.42%,突出表明了日本右翼团体小型化的趋势。据日本《右翼团体要览》的资料,全日本右翼团体中100人以下的小型团体占73.51%,其中10人以下的超小型团体占36.33%,甚至出现了“几人一党”,“一人一团”的情况,以及仅仅一个人却打出不同名目的多个组织的好几个旗号来进行活动的极端现象。这一类小型团体往往具有行踪飘忽、聚散不定、分化多变、难以防范的特点,常常出其不意地制造流血暴力事件,令日本警方防不胜防、疲于奔命。

第三,是右翼团体的基干人员总人数虽然只占全日本人口的千分之一,但他们活动能量却远远超过这个比例数,对于日本的社会思潮、政治倾向和民族情绪所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就更不是这个比例数所能反映出来的了。比如:1992年2月,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年仅20来岁的相原修一手持枪、一手握刀,闯进位于东京永田町的自民党总部,占据了自民党总裁办公室。此事一举轰动日本全国,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直到7个多小时之后,才以相原

《警方掌握的“日本右翼势力”现状》,《日》《选择》2000年5月。

修自动向警方投降而告结束。这一事件对于日本国内的政治影响,对于右翼团体的鼓舞和对于右翼思潮的推动,又岂能仅仅以个人行为而等闲视之。

尽管在警方的统计数字中,日本右翼团体仅有10来万人左右,最多不过12万人。但被称为右翼理论家的荒原补水却宣称,日本全国的右翼分子共有353万人。这一数字虽与警方的统计数字相差甚远,却也不能简单地就此认为右翼理论家是在夸大其词、故弄玄虚。因为日本警方统计的人数只包括那些积极参加街头暴力犯罪活动的右翼分子,即只有其行为对社会秩序和公众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或侵犯的右翼分子,才会被警方记录在案。而荒原补水所说的“353万人”则包括了大量在思想上认同右翼团体的政治理念,接受右翼思潮的观点,心理上和意识深层同情右翼分子的所作所为,对国内外事物按右翼的思维方式去认知、以右翼的价值标准做判断的日本人,他们被称为“穿西服的右翼”。这些人并不参加某个具有具体组织形态的右翼团体,也不参与右翼团体的街头暴力活动,只是接近或参加某个具有右翼倾向的文化或宗教团体,他们甚至往往不承认自己是右翼分子。但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却是右翼团体的潜在同盟者和后备队,一旦国内外局势发生重大变动,右翼团体猖狂活动之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很容易从思想上的右倾转为行动上的坚定右翼。尤其是一些在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大众传媒等领域拥有较大影响的“名人”,对于日本的政府决策和国民意识的潜在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日〕崛幸雄:《增补战后的右翼势力》,劲草书房1993年版,第1页。

〔日〕猪野健治等:《行动右翼入门》,21世纪书院1991年版,第216—217页。

四

在日本,右翼团体的兴衰成败历来与统治阶级有着密不可分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尤为明显。许多著名的右翼团体头目,往往出任政府或军队的高级职务。如: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上台的日本首相广田弘毅,就是日本近代第一个右翼团体“玄洋社”的重要成员。明治时期成立的“帝国在乡军人会”,在军部法西斯专政时期是“敕令团体”,其会长有末精三曾以陆军中将衔出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战后,这一组织摇身一变组成了“日本乡友联盟”,其成员多为持“大东亚战争史观”的退伍军人。而右翼团体“新日本协议会”的首领安倍源基则在战前出任过内务大臣、警察总监。号称“右翼帝王”的儿玉誉士夫,曾在中国的上海组建特务组织“儿玉机关”,与日本侵略军狼狈为奸,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被远东国际法庭定为甲级战犯,逃脱法律和正义的制裁后,又成为右翼团体“青年思想研究会”的会长。这些事实情况无可辩驳地说明,右翼团体在战前的政治化、国家化,右翼分子的一身二任,加速了日本国内政治和社会思潮的右倾化、法西斯化和军国主义化,最终导致日本国家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专政。战后以来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也使右翼团体与日本统治阶级的关系有了一些变化。一些臭名昭著的右翼分子已无法挤入日本政坛的前台,更多的政治家也顾及公众形象不再大事招摇地自我标榜右翼主张。右翼团体恢复战前“皇国政体”和天皇权力中心的政治诉求,更与维护议会制、政党制、内阁制、普选制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统治阶级主流派的政治主张发生

(日) 猪野健治等:《行动右翼入门》,21世纪书院1991年版,第216—217页。

了冲突。因此,与日本现行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的自民党总部、“经团联”总部,以及多位现任首相的官邸,都曾遭受过“反体制”的右翼分子的暴力袭击。

而且右翼团体崇尚血腥暴力,动不动就制造暴力流血事件,或者开着架起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在街头横冲直闯大声鼓噪,不仅引起广大日本国民的极大反感,也破坏了社会秩序的安宁和稳定,不利于资产阶级制度的长治久安,所以日本统治阶级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情况下,也对右翼团体的活动采取过一些压制和打击的政策措施。早在50年代,日本政府就曾修改刑法,增加了专门针对街头暴力活动的条款。日本警察厅也曾多次发布紧急指令,要求各地警察当局加紧取缔右翼团体的暴力恐怖活动和黑社会的暴力团。1991年日本国会还通过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以取缔街头暴力活动为目的的专项法案。但这些措施大多是针对右翼团体的暴力行为而采取的治标办法,并未能从根本上铲除右翼团体得以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从本质和整体上看,日本统治阶级与右翼团体互相利用、互为需要、互有所求的关系并未发生本质上的变化。资产阶级标榜“民主”、“自由”、“人权”,在一般情况下,不便于随心所欲地、无所顾忌地对国民和左翼运动使用暴力统治工具,为保持所谓“公权”、“公正”、“公平”,有时需要右翼团体的大声鼓噪和暴力活动阻遏国内左翼进步力量的发展壮大,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

实际上,日本统治阶级中的某些头面人物其实在骨子里从未真正放弃过“种族优秀”、“皇国中心”、“领导世界”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右翼团体的大呼小叫正好说出了这些人朝思暮想,但碍于身份、地位和时机不能说、也不便说的话。利用右翼团体的甚嚣尘上和大打出手,既可以鼓动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为日本走向“世界大国”鸣锣开道,又可以避免国际社会和国内和平进步力量把反对的

矛头直接指向统治阶级主流派,“以民间行为,政府不便干预”为借口,逃避政治责任。从这个“暗渡陈仓”、“移花接木”的意义上看,右翼团体能够在战后日本死灰复燃、以至今日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就不足为怪了。或许可以说,右翼团体正是日本现行政治体制、统治机器和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许多右翼团体头目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见到日本政坛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家。1987年,右翼团体“大东塾”的头目就国旗、国歌问题与首相竹下登长谈。1989年,“战前派”右翼分子中村武彦与首相宇野宗佑在首相办公室商谈皇室继承税问题。1990年,右翼团体“日本民主同志会”在京都为会长松本明重举行葬礼,1500多名参加者中不乏国会议员或政府高官,自民党的头面人物福田纠夫、中曾根康弘、竹下登等人也都送了花圈。日本统治阶级对右翼团体的另眼相待,于此也可略见一斑了。

当然,右翼团体也投桃报李,有钱者出钱资助政党竞选,无钱者或摇旗呐喊助威、或大打出手撒泼,使尽浑身解数为日本统治阶级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和帮助。早在1955年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时,“右翼帝王”儿玉誉士夫就曾拿出一大笔钱帮助自民党纾解建党之初的财政困难。反过来,右翼团体也要借助大权在握的执政党和政治家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重建皇国日本”。目前已经制订为法律的“建国纪念日”、“年号法”、“国旗(太阳旗)国歌(《君之代》)法”等,都是在右翼团体大力推动下,由国会通过并颁令全国执行的。1999年8月初(当时笔者作为访问学者正滞留日本东京),正当日本国会讨论表决《国旗国歌法》之际,东京的右翼团体多次出动,举行游行示威,几百辆漆成黑色或迷彩色的宣传车,成千名身穿迷彩服的右翼分子缓缓地行进在最繁华的市中心,高音

(日)猪野健治:《右翼民族派总览》,21世纪书院1991年版,第399—401页。

喇叭里不断传出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和战前的军歌声,为推动该法案的通过摇旗呐喊、推波助澜。

右翼团体与日本统治阶级之关系的密切程度,从其资金来源也可管中窥豹,略知一二。右翼团体号称“民间组织”,以从事政治活动为主、经营性活动为辅,缺少固定收入,因此从财大气粗的统治阶级手中得到财政支持,对于右翼团体的生存与活动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支持在战前主要是靠军部的保护和财阀的施舍,在战后则趋于多渠道、多元化,金额也有所增加。一是企业的“捐赠”。其实这种“捐赠”并非企业的自愿行为,而是迫于右翼团体近似于流氓无赖的敲诈勒索不得不“花钱免灾”。企业若不向右翼团体交钱,右翼团体或者邮寄恐吓信、威胁恫吓,或把企业、银行登出的广告转登在自己办的小报上,然后登门索取广告费。总之,各种“集金”手段层出不穷,直到企业自动交纳“捐赠”为止。二是组织巡回小队,到全国各地拉“赞助”。右翼团体“大日本菊水会”从1981年开始走遍日本征集签名,要求苏联归还北方四岛,所到之处均有收获,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威逼恐吓强拉硬要的伎俩。三是向政界人士伸手。右翼团体“防共挺身队”总队长福田进曾不无夸耀地说,只要去拜访政界人士,绝对不会空手而回,再不济也能弄个5万日元的“小费”。四是将资金投入股票、不动产或贸易、商业、制造业,通过表面上正当的经济活动谋取利益,以补充经费的不足。不过其中最主要的来源还是统治阶级的慷慨解囊,这是右翼团体最基本的资金来源。80年代—90年代,在日本被曝光的几乎所有丑闻中,都有大企业向右翼团体提供资金的黑幕,连著名的证券公司、大银行也不例外。经济上源源不绝的“奖赏”,清楚地说明了日本统治阶级与右翼团体政治上互相利用、思想上彼此认同的特殊

(日)猪野健治:《右翼民族派总览》,21世纪书院1991年版,第399—401页。

关系。

据日本内阁自治省统计:1978年381个右翼团体申报了资金收入,总金额为10.2亿日圆,平均每个右翼团体为270万日圆左右。1988年申报资金收入的右翼团体增加到655个,总金额为66亿日圆,为10年前的6倍多,平均每个右翼团体的收入超过了1000万日圆;其中年收入超过1亿日圆的有6个,超过5000万日圆的有20个;而年收入为0的右翼团体的数量则从1978年占总数的66%下降为1988年的33%。上述数字可以说明,右翼团体的资金收入,无论是整体规模、平均水平,还是增长的幅度和速度,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资金收入的不断增加,成为右翼团体得以长期存在和猖狂活动的物质基础。但是,1997年日本著名的证券公司和大银行向“总会屋”(右翼暴力团体控制之下一组织,专门在收取银行或大公司的好处费之后,在股东大会上秉承公司方面的意旨,或压制普通股东,或制造混乱干扰会议的顺利进行,为维护 and 实现银行或公司的利益效劳)提供好处费的事件被媒体曝光以后,日本警方开始取缔“总会屋”及其背后的右翼暴力团组织,企业在向右翼团体提高资金时也更为谨慎。加上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很多企业以业绩不佳为由减少或停止对右翼团体的“赞助费”,不再订阅右翼团体出版的刊物。右翼团体资金来源减少,只好停办刊物,关闭事物所,以降低开支。

五

日本的右翼团体派系众多、五花八门,有继承战前谱系的“传

(日)木下半治:《日本右翼的研究》,现代评论社1977年版,第199页。

《警方掌握的‘日本右翼势力’现状》,(日)《选择》2000年5月。

统右翼”,有热衷于街头暴力活动的“任侠右翼”和“行动右翼”,有强调反对现行政治体制的“新右翼”,也有专门从事政治思想研究和宣传的“思想右翼”,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无论属于何种派系的右翼团体,在政治思想和行为方式上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主要是:

1. 鼓吹“皇国史观”,推崇封建主义、军国主义和复古主义的传统思想,主张使日本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政治状况,试图拉历史倒车。

2. 强调“皇权至上”,主张建立一个如同战前那样,以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中心、以军部独裁为本质特征,以右翼势力为基本主体的国家权力结构和政治体制。右翼团体“八千矛社”提出:“日本国宪法改变了日本三千年的历史与传统,是日本被占领的屈辱的纪念碑。日本要达到真正的独立,就要废弃占领宪法,复活日本帝国宪法。”

3. 鼓吹“种族优秀论”,宣扬“大和民族优秀论”,崇尚以力服人、一刀一枪的武士道精神,奉行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强权主义行为准则,歧视弱小民族和落后国家,以亚洲乃至世界的领导者自居,主张通过征服他国来建立日本国际领导权。

4. 否定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道路,反对现行和平宪法;要求修改《自卫队法》,在内阁设立“国防省”,把自卫队改编为正式的国防军;主张废除“无核三原则”,开发核武器,发展核力量;要求废除“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主张向海外派出自卫队,以军事大国的实力地位和身份参与国际事务,解决国际问题,承担更为广泛的国际安全义务。认为“支持腐败的自民党政府,赞成从属于美国的安保

(日)岩井利夫:《新闻记者的右翼研究》,经济往来社1976年版,第36页。

条约,这与右翼的传统毫无关系”。

5. 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运动。日本右翼势力的诞生与发展,一直与反共联系在一起。20世纪初,随着日本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右翼势力也猖狂起来;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复活,也是与民主改革、释放政治犯以后,日本国内左翼运动空前高涨紧密联系在一起;右翼总是作为左翼和进步运动的对立面出现在日本的政治舞台上。右翼理论家荒原补水认为:“750个右翼团体没有一个不是高举反共的大旗。”

6. 在对外关系上,右翼团体几乎是反对和否定一切国家。对美国,认为日美安保体制束缚了日本的自由发展,反对政府在日美贸易摩擦中态度软弱、让步过多,主张坚决反击美国对日本的“敲打”。对俄罗斯(苏联),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任何方式夺回北方四岛。对中国,反对政府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等问题的处理,美化侵略历史,否认侵略战争,鼓吹“自由主义史观”、“大东亚战争史观”,要求改变“自虐的东京审判史观”。在我国领土钓鱼岛上树立灯塔和神社、涂写反华标语,在大阪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会议。从而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从学理的角度严格地说,日本的右翼团体并无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政治纲领,往往是拾近代以来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牙慧,就事论事地提出一些口号和主张,与其说是理论思想,不如说是观点的堆积、情绪的发泄、心理的变态、行为的偏执和歇斯底里的发作。日本东北福利大学教授崛雄幸认为:如果说右翼团体有所谓理论,也只能算是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战后右翼在理论上并无创新,所谓荒原补水、小岛玄之一辈的“右翼理论

〔日〕池田寅:《日本的右翼》,大和书房1970年版,第116页。

〔日〕猪野健治:《右翼民族派总览》,21世纪书院1991年版,第399—401页。

家”，只不过是把战前右翼的理论学说加以修饰改造，涂上了时代的油彩而已。奈谷浦太郎也指出：“战后右翼的主要特征就是无思想性和行动的虚无性。”

无论如何，日本右翼团体的“理论思想”和暴力行为逆历史潮流而动，代表了日本社会中落后野蛮的部分，其反动性是其政治诉求的落后性和行为方式的野蛮性所决定的。

1. 右翼团体以“武士”的传人自居，信奉“强权即是真理”和刀剑枪炮的威力，嗜好暴力流血的恐怖行为，或开动架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喧哗鼓噪于大庭广众之中，或大打出手于光天化日之下，违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运作程序和游戏规则，既破坏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干扰了国民生活的安宁。因此日本的媒体经常收到国民的来信、来电，严厉谴责右翼团体妄图“以暴力恐怖的方式挽救和治理日本”是对历史与和平的反动。

2. 右翼团体尽管派系众多、口号繁杂，但其本质特征和价值取向基本是一致的，都是主张封建的皇权中心，要求回到战前的皇国时代，恢复历史上专制暴虐、野蛮落后的传统，这种倒退复古的政治主张，违反了日本社会历史的发展潮流和国民的愿望。

3. 右翼团体以封建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专制独裁的政治理念，否定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理念核心的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价值标准，违背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

4. 右翼团体狂热地鼓吹复活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要求正式建立国防军和派兵海外，妄想重温大日本帝国、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竭力推动日本政治向右转，不仅将会把日本引到半个世纪前的灾难道路，也必将给亚洲各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亚太地区的稳

〔日〕奈谷浦太郎：《战后右翼势力》，三一书房1960年版，第23—24页。

《警方掌握的‘日本右翼势力’现状》，〔日〕《选择》2000年5月。

定与发展带来新的威胁。因此日本右翼虽然只是国内力量,却成为地区内的不安定因素之一。

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以及日本国内政局的分化组合,日本社会党等左翼革新阵营的力量和政治影响急剧下降,使得以反共、反苏为号召的右翼势力失去了意识形态和对抗行动的对立面,不能不再一次调整策略方针,进一步向极端民族主义的方向发展,以“民族主义的回归”作为口号。日本右翼团体的政治活动范围有所扩大,几乎对所有重大的国内外问题均采取引人注目的行动表示反对或支持,竭尽全力表明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力量存在,力图推动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和社会政治思潮向右转。

在思想理念和口号主张上,右翼团体不再提“反共、反苏”,而是提出“发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皇国民族国家”、“同一血脉和民族魂”,强化了民族和文化的特色,甚至堂而皇之地叫嚣起“八紘一宇”、“尊皇攘夷”、“神国日本”等战前右翼的口号。皇国宪政党、皇道青年会、日本皇民党、大日本八紘塾、大日本殉皇会、大日本报皇会、皇道民族联盟、皇道维新塾等军国主义气息浓厚的右翼团体也层出不穷。由此可见,日本右翼的所谓“民族主义回归”,实际上就是回归到战前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在对外关系方面,右翼团体主要是攻击作为日本近邻的中国和韩国、朝鲜。1996年,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而一时紧张,日本420个右翼团体,约1520人,上街游行示威,呼喊反华口号,肆意攻击中国,批判日本政府的对策。1997年发生教科书问题时,右翼势力动员了1710个团体,7120人,出动宣传车1860辆次,在全日本各地展开“不能容忍自虐性的教科书”的街头宣传活动,并在东京捣毁了反对右翼所作所为的民营广播公司的大门。1996年1月到1997年5月,右翼团体因教科书问题对出版社进行威胁的事

件已达 140 多起。1996 年 7 月,日韩围绕竹岛(韩国称为独岛)发生纠纷,日本右翼团体制造了冲击韩国驻日本大使馆和烧毁车辆的事件。1997 年 1 月,韩国总统金泳三访问日本,右翼势力动员 800 多个团体,约 3670 人,出动宣传车 1080 辆次,在广岛、大分等地举行抗议活动,并向韩国驻大阪领事馆扔燃烧瓶。1998 年 8 月,日本右翼团体认为朝鲜发射了穿越日本上空的导弹,采取了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动员了 820 个团体,约 3820 人,出动宣传车 990 辆次,抨击旅日朝鲜人总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强防卫力量。12 月,又刺伤了主张开展对朝鲜贸易的新潟市市长,并采用暴力阻止朝鲜轮船“万景峰号”进港。由于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损害了日本的国家形象,因此日本警方对右翼团体的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当年,警方一共取缔了 254 起右翼团体的街头暴乱,逮捕 380 人,搜缴 107 支枪械。

在内政方面,右翼团体也加大了对现行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的批判,竭尽全力推动日本政治倾向和社会思潮的“保守化”和“右倾化”。日本右翼团体声称,1995 年是战后 50 年总清算的“斗争之年”,为反对国会通过“战后 50 年决议”,动员了 200 多个团体,2100 多人,出动了数百辆宣传车,在东京街头游行示威。1997 年,住宅金融专业公司的丑闻被曝光后,右翼团体也动员了 180 个团体,约 1200 人,出动宣传车 400 辆次,上街游行示威。由于扰乱了治安秩序,被警方立案侦察 208 起事件,324 人被捕,116 支枪械被收缴。大藏省官员贪污事件发生后,右翼团体又一次纠集 330 个团体,约 680 人,出动 160 辆宣传车,开展抨击政府的宣传活动。日本警方立案侦察了 936 起事件,逮捕 1239 人,收缴了 82 支枪

《警方掌握的‘日本右翼势力’现状》,《日》选择》2000 年 5 月。

械。正如日本学者所说：“战后右翼只不过是在行动上继承了战前右翼的思想，即国家主义的传统，那就是以武力作为后盾的暴力活动。”目前，日本国民对右翼团体的逆流而动和街头暴力越来越反感，社会各界对右翼团体的批评也比比皆是，加上警察当局对街头暴力活动的大力取缔，使右翼团体的活动空间有所萎缩。同时冷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暴力和动荡越来越不受欢迎。

由于苏联的解体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使得日本左翼力量逐步削弱，政策主张向保守政党靠拢，所以与左翼对抗而出现的右翼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也随之减弱。特别是战后以来的右翼头面人物纷纷死去（1990年2月6日，赤尾敏死去。同年2月16日，头山满的孙子在其父墓前自杀。1992年6月10日，战后右翼理论家苇津真彦病死。1993年10月20日，新右翼的代表人物野村秋介自杀）。使得所谓“本流右翼”、“纯正右翼”逐渐走向没落。

但右翼团体的骨干队伍大体上依然故我，“潜在的右翼”也大有人在，右翼团体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尤其是走上街头的行动右翼与活跃在文化、教育、思想、出版、政治、经济等各界的右翼正在进一步互相结合、互相呼应，以文化活动和学术研究作为幌子的右翼思潮和活动正在发展。如：每当“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对坚持历史真实的媒体或出版社以及个人发起文字攻击时，右翼团体的暴力攻击也会接踵而至。日本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藤冈氏与其研究会起着右翼行动的‘司令塔’的作用。”而高桥史郎、入川智纪等右翼团体“日本青

〔日〕奈谷浦太郎：《战后右翼势力》，三一书房1960年版，第23—24页。

〔日〕高木正幸：《右翼——团体与活动》，土曜美术社1989年版，第12页。

〔日〕藤义文：《教科书攻击的深层》，学习之友社1997年版，第50页。

〔日〕堀幸雄：《增补战后的右翼势力》，劲草书房1993年，第1页。

年协议会’的10名右翼分子,又是“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员。因此,值得注意和忧虑的恐怕不是街头右翼的吵吵嚷嚷、打打闹闹,而是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出版等各界上层的右翼化倾向。1990年,在东京举行了纪念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自杀20周年的“忧国祭”,日本的文艺界、出版界和社会上还兴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三岛热”。1992年2月,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的相原修一手持刀、一手拿枪,闯近自民党总部,占领总裁办公室长达7个多小时。1996年,右翼团体“大日本青年社”在我国领土钓鱼岛上建立灯塔,并登岛活动。2000年1月,又是右翼团体在大阪举行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集会。

事实说明,在当今日本,右翼团体仍然本性难移、怙恶不悛,仍然在处心积虑地妄图使日本倒退回战前的时代。正因为如此,如何对待右翼团体的存在和活动,如何坚持战后以来的和平发展道路,如何防止右翼的政治思潮进一步泛滥乃至左右日本的政治发展方向,如何向世界人民和国际社会清楚而明确地表明日本国家和民族将来是否会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和方向,仍然是进入21世纪的日本政府和国民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也许还是像崛雄幸教授所说的那样:右翼团体所鼓吹的陈旧思想和反动观念仍然存在于日本的社会意识之中,只有经过一场思想理念和心理深层的真正的“文艺复兴”,才能彻底清除右翼团体得以滋生繁衍的社会思想基础。日本才能真正地实现整个民族和全社会的现代化。

(作者林晓光,1954年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兵)

[日]崛雄幸:《增补战后的右翼势力》,劲草书房1993年版,第1页。